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MING DAI DA CI
FA WANG YAN JIU

陈楠 著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陈小南 编著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陈楠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 7-81056-968-6

I . 明… II . 陈… III . 释迦也失 - 人物研究
IV .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5204 号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作 者 陈 楠
责任编辑 晓 默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发行部) 传 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5 彩插:4 页
字 数 186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68-6 / B·22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头，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视作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体发展。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眼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所以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所谓“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

和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研究的核心集中于此，这个书系自然也反映这个特点。中国历史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到一体格局的形成，足以证明忽略民族和民族关系是不可能搞清中国历史发展面貌的，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已成常识，但是具体微观的研究仍然缺乏，这不是说已有的成果不多、不丰富，只是这个领域提供给人们的空间实在太大，足以让我们和后人沿着前贤的足迹继续前进。本书系设立的目的即在这里。

具体到这个书系本身，我们采取的原则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专著的作者多数是本系的教师，也有部分校内外的同行，若条件允许，本系离退休教师的作品也将列入其中。我们之所以搞这个系列，主要是从专著本身具有较高学术性的角度着眼的。一般认为，所谓专著是指作者本人长期研究的课题，作者长期专注与此，对研究的问题当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或者学术新意，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当然，相应的荣誉和承担的责任也由作者本人负责，所谓文责自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愿以此作为本书系宗旨之一。

历史系的教师不多，而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分散，用一个主题去限定恐有不周之处，故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名，将这个领域内与此有关的作品收入，经过系列出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整套的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将会在一个方面反映历史系科研的面貌，同时也能反映民族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风貌，到那时如果能够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序

方立天

在 2005 年将至的一个聚会上，陈楠教授满怀欣喜地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即将由她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这是件大好事，我为她高兴。随后她诚约我为这部专著写一篇序文，自然，这是我应该也是我乐意做的。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我和陈楠有一段师生关系的殊胜因缘，她的强烈事业心、积极进取精神和勤奋好学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评委一致的好评，之后，又经过三度认真的修改，当益臻优异和规范；论文的主题大慈法王研究，既具开创性意义，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慈法王（1354—1439），原名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近侍弟子，是八大弟子的首座。他不仅精通格鲁派的显宗经典义理，而且还擅长格鲁派的密法仪轨。大慈法王年长于宗喀巴三岁，然其圆寂又晚于宗喀巴大师二十年。在宗喀巴圆寂后的二十年间，实际上他是开创不久的格鲁派的领袖。大慈法王应明代皇帝之诏入朝，两次受封，多次朝贡，为密切西藏地方与明朝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还在南京、北京、五台山以及青海、甘肃等地弘法传教，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增强了汉藏民族的团结。大慈法王既是明代西藏地方政教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汉藏民族关系史上的纽带式人物。对这样一位有着特定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本应加以重点研究，但由于现成资料的匮乏、藏文相关文献搜集之困难等情况，当代研究大慈法王的成果一直是寥寥无几，乏善

可陈。

陈楠教授积多年之功，在广泛搜集藏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联缀零星分散的历史残片，追寻扑朔迷离的历史足迹，深入考证，判别真伪，辨证分析，整体构建，比较完整、准确地勾勒出大慈法王的生平事迹与特有风貌，再现了大慈法王的本来面目与历史功绩。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一书，正文由导论和七章组成，资料翔实，内容丰满。该书系统地论述了释迦也失出生前后西藏地方政教的历史背景，释迦也失出生与出家的情况，释迦也失与格鲁派的宗教关系和主持兴建格鲁派的第三大寺院色拉寺的有关情况，几次朝贡与受封“大慈法王”的经过以及大慈法王在内地和青甘地区的传教事迹。文后还附有《释迦也失年谱》、《汉藏专有名词对照表》和主要参考书目，体现了严格的学术规范，也方便于读者。

本书的写作与内容均富有特色，其荦荦大端有：

一、资料扎实。作者非常重视藏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开发利用。除运用传统的《红史》、《贤者喜宴》、《新红史》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以外，还千方百计地蒐集到班钦·索南扎巴所著《大慈法王传》，这一珍贵资料是研究大慈法王最为确凿可靠的藏文文献。还有洛桑泽培所著的《蒙古佛教史》和图布丹宗泽所撰的《色拉教法史》，也是研究大慈法王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由于资料搜集相对完备，作者且能直接解读藏文文献资料，这就不仅保证了研究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而且还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内容丰富。作者在解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剔抉爬梳，潜心研究，着力于论述释迦也失在格鲁派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又深入考察释迦也失与明王朝的关系以及往来内地的一些历史事实和弘法活动，进而阐明释迦也失在推动西藏

地方与明王朝中央的关系以及促进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积极贡献。在上述内容基础上，作者高度评价了释迦也失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以及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为人们完整地了解释迦也失这一重要历史人物以及与其相关的宗教史、政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详尽的历史信息。

三、见解新颖。作者善于研读和运用文献资料，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诸如：释迦也失在皈依宗喀巴以前，原是噶当派僧人而非噶举派僧人；释迦也失第一次从西藏入朝是在南京而非在北京，在南京是驻锡能仁寺；释迦也失在南京期间曾为明成祖传授长寿灌顶密法，明成祖信奉藏传佛教确有史实根据；详细考证释迦也失自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后，曾五次遣使朝贡的历史事实与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看法；释迦也失曾三上五台山，驻锡显通寺，而显通寺即华严寺，也称花园寺；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是驻锡大慈恩寺而非法渊寺；对大慈法王封号为何仅一代而终的特殊原因作了深入考察，阐述了独特的见解；对释迦也失圆寂的时间、地点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等等。这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见解，把有关释迦也失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陈楠教授刻苦用功，勤奋上进，专心研索，好学深思，她取得优异的科研成果不是偶然的。我衷心祝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地推出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为繁荣伟大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新贡献。

2004年12月3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释迦也失出生前后西藏地方政教历史背景	(7)
第一节 藏传佛教各教派兴起和发展概貌	(7)
一、噶当派	(9)
二、宁玛派	(11)
三、噶举派	(13)
四、萨迦派	(15)
五、其他教派	(17)
第二节 元朝中央对藏区的经略概况	(21)
一、人口调查、设置驿站与行政建制	(21)
二、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	(22)
三、元代西藏政教关系的深刻变革	(24)
第三节 元朝在西藏地方的管理机制	(29)
一、元代西藏地方建制的内在隶属关系	(31)
二、萨迦地方政教集团在乌思藏的特殊地位	(35)
三、帕木竹巴等其他政教势力集团与萨迦的关系	(40)
第二章 释迦也失出生及出家	(43)
第一节 蔡贡塘寺与蔡巴噶举	(43)
第二节 释迦也失出家学佛	(52)
第三章 释迦也失与格鲁派的关系	(57)
第一节 宗喀巴大师及其宗教思想	(57)

一、宗喀巴青少年时代学佛事迹	(57)
二、宗喀巴接受大乘佛学中观思想	(61)
三、宗喀巴佛学思想之特色	(64)
第二节 释迦也失皈依宗喀巴	(69)
一、宗喀巴与蔡贡塘的关系	(69)
二、释迦也失成为宗喀巴的近侍弟子	(73)
三、师从宗喀巴修习显密教法	(74)
第三节 追随宗喀巴参与格鲁派的创建活动	(82)
一、陪伴宗喀巴学习密法时期	(82)
二、跟随宗喀巴辗转卫藏各地从事宗教活动时期	(86)
三、拉萨大祈愿法会的召开与甘丹寺的修建	(89)
第四章 释迦也失与明朝建立封授关系	(92)
第一节 关于明朝“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	(92)
一、明太祖对藏区的“广行招谕”政策	(92)
二、明成祖敕封“五王”与“两大法王”	(97)
第二节 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实	(104)
一、《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	(107)
二、《宗喀巴复明成祖书》	(111)
三、《宗喀巴与关大人书》	(115)
第三节 释迦也失第一次奉旨入朝	(119)
一、释迦也失先在五台山等待皇帝召见	(121)
二、去四川迎接释迦也失的是太监侯显	(122)
三、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应是南京而非北京	(123)
四、释迦也失第一次受封号	(124)
第五章 释迦也失主持修建色拉寺	(126)
第一节 建寺之缘起	(127)
第二节 色拉寺的兴建	(130)
第三节 释迦也失离开色拉寺及其法系传承	(138)

第六章 释迦也失几次朝贡与受封“大慈法王”	(143)
第一节 明朝中央与藏区地方朝贡与赏赐制度	(143)
第二节 释迦也失的几次朝贡	(152)
第三节 释迦也失受封“大慈法王”	(158)
第七章 大慈法王在内地及甘青地区传教	
事迹考述	(162)
第一节 释迦也失在南京及其与明成祖的关系	(162)
第二节 释迦也失在五台山	(170)
第三节 释迦也失在北京	(181)
一、驻锡大慈恩寺	(182)
二、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的宗教活动	(186)
三、大慈法王圆寂	(190)
第四节 释迦也失在青海、甘肃等地的宗教影响	(195)
附录一 释迦也失年谱	(202)
附录二 本书汉藏专有名词对照表	(210)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224)
后记	(230)

导 论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与其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杰出人物。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就是明代西藏地方政教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大慈法王（1354—1439），本名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近侍弟子，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时期的重要人物。据藏文史料记载，此人自幼出家，早期为蔡巴噶举僧人。他聪慧勤奋，博闻强识，通晓藏传佛教律仪和显密二宗的多种经典。在追随宗喀巴大师之前，在本地及本教派中就已是颇有名望的高僧了。他比宗喀巴大师年长三岁，师从宗喀巴后，一直是宗喀巴大师的近侍弟子，在宗喀巴座前聆听多种显密教法，在宗喀巴大师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位列宗喀巴大师八大弟子之首位。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宗喀巴的近侍弟子，他侍奉宗喀巴30年，跟随师尊参与了格鲁派创建前后一系列的宗教与社会活动，而且亲自主持修建格鲁派第三大寺院色拉寺；作为一个格鲁派僧人，他勤学苦修，不仅精通格鲁教派的显教经典义理，更擅长格鲁派的密法仪轨；作为一个应诏入朝的藏传佛教高僧，他谨尊师命，不辱使命，两次受封号，多次入贡，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皇帝，特别是与明成祖和宣宗皇帝关系密切，对连接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特别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一个最早来到内地的格鲁派高僧，他恪尽

僧人本分，随处教化。在南京、北京、五台山及青海、甘肃等地区都留下了他弘法传教的足迹，为格鲁派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客观上也对藏汉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藏汉民族的团结友谊做出了贡献。

对于大慈法王这样一位有历史影响的格鲁派的重要僧人，国内外藏史学界自然很关注，也有学者对大慈法王作过一些研究考证。但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研究大慈法王的专门论著。稍深入一些的研究应该是日本佐藤长先生的《明代西藏八大法王考》^①，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将此文译成汉文，其他相关研究在于道泉先生、王尧先生、陈庆英先生、周润年先生以及沈卫荣博士等人论著中亦有所涉及。

显然，对大慈法王这样重要的人物，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很不够。首先是资料缺乏，这是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有关大慈法王的历史记载很有限，常见的汉文典籍中仅《明史》、《明实录》中有敕封与遣使朝贡的记载。《清凉山志》、《新续高僧传》中有一些关于释迦也失与五台山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零星简略，而且互有出入和矛盾，几乎无法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其次，传统藏文文献中关于大慈法王的记载虽不很多，但还是有一些，对于这些资料，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很好地开发利用。究其原因，一是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二是受语言限制，大多数学者也很难直接使用较为零散的藏文文献进行专门研究。另外，藏学研究虽为国际学术界看重，毕竟起步较晚，且多学科交叉，内容广博，很多有意义的专题研究尚未及进行。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明代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也

^① 日本《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期，196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研究员已将此文译成汉文并连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第4期，1988年第1期。

随着一批重要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关于大慈法王的研究也提上日程，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而这项工作的开展，首先得益于一些重要藏文文献资料的开发利用，笔者所依据的藏文史料除传统的《红史》、《贤者喜宴》、《新红史》、《西藏王臣记》外，还有以下三种材料：

其一，《大慈法王传》，笔者手中复印件是旅美藏学家沈卫荣博士惠寄海外，系藏文写卷，稍残，个别地方漫漶不清，页码也有错乱之处。虽经多方努力，遗憾的是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和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都未找到原件。据第 22 页所记，该书内容出自班钦·索南扎巴（1478—1554）所著《教法史》。据《黄琉璃》及《隆多喇嘛全集》等记载，班钦·索南扎巴是格鲁派的著名高僧学者，先后就任过甘丹寺墀巴（座主、法台）、哲蚌寺法台及色拉寺住持，其学识渊深，不仅深通藏传佛教显密二宗教义，而且对西藏教法历史及社会历史亦有很深研究，其传世的名著《新红史》，是国内外藏学界十分重视的藏文历史名著，对研究元、明西藏历史更具重要参考价值，现已有英译本和汉译本出版。班钦·索南扎巴生卒年比释迦也失约晚 120 年左右，其所记明代西藏历史也是当代人记当代事，而直至目前，其所记关于大慈法王的历史应该是最早的版本，弥足珍贵。该藏文文献是本课题研究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利用这份最为直接的藏文文献，使本课题研究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研究力度上都将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

其二，《蒙古佛教史》（又译《霍尔佛教史》）。该书作者为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洛桑泽培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生平事迹不详。“据他在本书中说，他于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鼠年（1780 年，清乾隆四十五年）7 月 5 日在察汗加拉克地方与四百多僧人一起从六世班禅受比丘戒。我们知道崇奉藏传佛教的僧人一般在

二十岁受比丘戒，所以估计他生于 1760 年前后。”^①《蒙古佛教史》成书于藏历第十四饶迥土兔年（1819），该书写作笔法与其他藏文史籍大同小异，也是以一定篇幅叙述印度王统、吐蕃王统、蒙古王统及元、明、清各朝王统，但其核心内容是叙述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因为最早把格鲁派教法传至内地的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因而书中对大慈法王有专节叙述。而其中大部分内容与班钦·索南扎巴的《大慈法王传》相同，可以认定，作者在著述此书时必当参考了前者。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还藏有鲜为人知的《蒙古佛教史》蒙文抄本，据陈庆英、乌力吉两位先生考证，该蒙文抄本应是藏文本的译本，译者及翻译年代尚不清楚^②。《蒙古佛教史》由于记载了大量的蒙藏之间文化相互影响的史实，对研究蒙藏关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方学术界在百余年前就已关注此书，先后有德文译本和日文译本传世。陈庆英和乌力吉两位先生的汉文译本于 1990 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也已引起国内民族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其三，《色拉教法史》，该书全称为《诸多渊博智者所居拉萨三大古寺之一色拉大乘丛林教法史明晰宝鉴》，于 1991 在德国格廷根（GÖTTINGEN）出版发行，英文与德文译名分别为：HISTORY OF THE MONASTIC UNIVERSITY—SE-RA-THEG-CHEN-GLING；Geschichte der Kloster Universität Se-ra-theg-chen-gling。该书作者为旅德藏人恰木巴·图布丹宗泽，书中叙述色拉寺从 1418 年创建至 1959 年的教法传承的历史。大慈法王是色拉寺的创建者，书中有专门章节叙述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生平事迹。根据内容判

^① 引自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译注者前言。清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循顺治帝召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旧例，召六世班禅来京，驻锡热河，利用六世班禅的宗教影响绥服蒙古各部，安定西藏，以巩固清朝统治。班禅觐京途中曾为许多蒙古僧人摸顶授戒。

^② 同上书，译注者前言。

断，该书作者关于大慈法王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参考书就是班钦·索南扎巴的《大慈法王传》，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史籍。该书作者虽是当代藏人，但由于 1959 年许多西藏贵族僧人追随十四世达赖出逃时携走大量藏文典籍，有些藏文文献反而在国内很难找到，抛开政治立场、观点等因素，有些研究历史的资料是十分珍贵的。虽然该书内容上没有太多新意，更谈不上汉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有些观点也失之于偏颇，但对本书的写作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本书在广泛搜集藏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把零星点滴的历史残片连缀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有机而完全的整体，勾勒出明代大慈法王的生平事迹之概貌。

首先，基本搞清了释迦也失在格鲁派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确定释迦也失在格鲁派发展史上的地位。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传统藏文文献典籍只记载宗喀巴的宗教思想理论及其实施宗教改革、创建教派的实践过程，而绝少涉及其弟子们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八大弟子中最年长的释迦也失是留下资料最少的一位，因而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根据信史所记，当明朝皇帝派人邀请宗喀巴进京朝觐时，宗喀巴以教派始创不能脱身为由而婉拒。其后，朝廷再派人力邀时，宗喀巴则命释迦也失代替自己东赴内地。从内地归来后，宗喀巴又命释迦也失主持修建色拉寺。宗喀巴于 1419 年圆寂，其后释迦也失被敕封为“大慈法王”，这是格鲁派僧人从明朝廷获得的最高封号。释迦也失于 1439 年在北京圆寂，其弟子奉命将其塔葬于青海卓木喀地方。而从 1419 年至 1439 年，其间 20 年，释迦也失无疑是初创未久的格鲁派的事实上的首领。单就这些内容，有理由相信，释迦也失在格鲁派创建发展史上应具一席比较重要的地位。

其次，释迦也失是联接格鲁派与明朝廷关系的代表人物，他两次受赐封号，是明代藏区三大法王之一。本书重点之一是考证

清楚释迦也失与明朝关系及往来于内地的一些历史事实，这是研究释迦也失历史生平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因而本课题研究不仅仅简单涉及一个藏传佛教高僧，而对于深入探讨明代治藏宗教政策、明中央与藏区地方关系、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明显薄弱，致令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在这方面做文章，认为明代西藏处于相对“独立”状态。这些谬论虽不堪一击，但也引起了藏学研究者对明代藏史研究的关注，近些年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研究课题的完成，将会在明代藏区与中央关系研究方面增添一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另外，释迦也失两次奉诏入京，出使内地，实是出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作为一个僧人，他在内地的许多活动是与宗教内容密不可分的。他是促进藏传佛教格鲁派东传内地的第一人。搞清楚释迦也失在内地传播格鲁派教法的一些基本情况，也是本书中的一个重点内容。这对于研究格鲁派传播的历史概况、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以及明代蒙藏关系等方面研究亦有比较重要的意义。